



蒋胜男

## 蒋胜男:建议成立国家层面网络文艺工作者协会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麟

近年来,网络文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基因,强调“两个结合”,坚持人民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作家、编剧,温州大学网络文创研究院院长蒋胜男认为,目前网络文艺行业发展仍存在创作主体分散化、行业标准缺失化、价值引导薄弱化等突出问题,亟须开展全国性、全领域性的行业教育、行业自律、行业服务、行业管理。

**一是建强网络文艺大军,夯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艺力量,亟须加强网络文艺组织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网络文艺工作者规模近亿人,其中网络文学作者规模已达2405万人,网络表演(直播)行业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8亿个(多平台非去重数据),网络音乐、动漫、影视等新兴领域从业者年均增长率超过15%,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70亿人。蒋胜男表示,一些相关文艺

组织机构在层级、构成、形式、职能上不完全相同,对网络文艺工作者的覆盖有限,组织、团结、引导、服务、协调还比较薄弱,与网络文艺高速发展态势和庞大规模不相匹配,难以满足广大网络文艺工作者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网络文艺工作者组织的心声,同时也不利于集中网络文艺的优势力量,更加精准、更高质量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二是聚力网络文艺精品创作,铸就民族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亟须加强专业化组织化引导。**创作生产优秀作品是文艺的中心环节,繁荣文艺创作、推出精品力作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网络文艺行业生产传播着海量的作品,但存在着重流量轻质量,内容同质、类型跟风、精品不多等问题,“见招拆招”式的零散应对,难以对网络文艺创作生产进行清晰、明确、精准、到位的导向引领。因此,亟须持续提高网络文艺创作引导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不断健全网络文艺创作扶持引导和评论推介机制,引导网络文艺工作者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把精品化创作生产作为中心环节,创作生产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网络文艺新篇章。

**三是强化网络文艺理论评论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艺话语体系,亟须加强示范引领和组织推动。**网络文艺是建设中国原创性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扩大中国文艺理论影响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力量和重要领域。然而,当下国内外网络文艺本体理论研究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创作、传播、审美等一套学术体系框架远未建立,亟须发挥行业组织的示范引领和组织推动作用,系统性提出具有原创性、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的理论观点,生成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原创思想和崭新话语,建立起网络文艺领域重要概念、范畴的定义权和解释权,打造具有鲜明原创性和标识性的中国网络文艺学科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文艺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影响力。

因此,蒋胜男建议:在中宣部指导下,由中国文联成立国家层面的中国网络文艺工作者协会这个社会团体,对全行业网络文艺工作者开展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推动网络文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高质量发展。



刘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刘宁的履职足迹始终与书相伴。近年来,她以“书”为纽带,从呼吁扭转“重论文轻专著”的学术生态,到推动古籍“走下高阁”、走向大众,在学术创新、全民阅读、古籍传承等领域躬身力行,致力让思想沉淀为著作,让典籍流动为血脉,让文化的力量在翻阅书页中生生不息。

“学者十年不著书,却争相追逐顶刊论文——这是学术生态的隐忧。”刘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学界症结。她调研发现,当下,出版社大量再版旧书,而新学术专著的出版并不活跃。许多编辑反映,向学者约书稿很困难。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学者们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论文写作中,而忽视了专著的写作。尤其是年轻学者,更因考核机制“重论文轻著作”而极少用心锤炼专著。

“一本专著的学术价值,不应被等同于一篇核心期刊论文。”作为一名学者,刘宁一直坚持写书,近年出版的专著《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凝聚了她多年心血。她认为,专著可以表达系统深入的思考,远比论文厚重;同时论文往往只是学科同行关注,其他学科的读者就已经很少,更遑论社会大众。学术著作的读者面极为广泛。不仅学科同行关注,其他学科的读者也会饶有兴趣,社会大众也会广泛关注。

**只有打破“论文GDP”的功利导向,才能让学者更好地回归“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同时也能让更多优秀的学术成果通过著作的形式走向社会。**为此,她呼吁改革学术评价体系,提高专著的权重,鼓励学者们潜心著书。“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图书的质量,也需要保证相当的新书数量。图书市场的活力与学术文化的繁荣,始终离不开新书的持续涌现。”刘宁强调。

刘宁告诉记者,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自2020年世界读书日开启后,一直延续至今,形式不断创新,成为倡导建设“书香政协”的有力抓手。刘宁积极参与其中,担任读书群群主与荐书组成员,推动“读书+履职”深度融合。

“全民阅读的根基在于书,生命力在于传播。”基于对全民阅读的关注,在日常工作中,刘宁十分留意图书传播。她在调研中发现,“现阶段,很多读者对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但公共图书馆的新印古籍购藏,普遍缺少系统规划。不少图书馆新印古籍的购藏版本也良莠不齐。在购书经费、馆藏空间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忽视版本质量,浪费了经费,导致读者难以接触到权威、可靠的版本。”

对此,她提出加强全民阅读版本优化工程,联合古籍专家制定权威书单,指导公共图书馆优选经典版本,并推动书单走向大众。“一本好书,就是一座灯塔。我们要让大众读得懂、读得准、读得深。”刘宁说。

“古籍不能锁在库房里‘养老’,要让它开口说话。”以古典文献研究为主要工作的刘宁,对古籍活化有着独到见解。“古籍传承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是抢救性保护,二是创造性转化。”她曾提出关于建设中华典籍传承基地的建议,如依托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建立“中华典籍传承基地”,深入开展中华典籍传习等各项活动,深度服务地方公共文化建设。此外,她力推“古籍人才振兴计划”,建议将古典文献学设为一级学科,构建“修复—研究—传播”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

谈及未来,刘宁的“书香版图”愈发清晰——继续鼓励大家多写好书,同时要把古书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为“书香中国”建设做更多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要更加关注、关心年轻人,他们是学术发展的生力军,希望他们能够为学术界多出精品力作,也希望学术界与出版界很好地联合起来,让好书走向千家万户,真正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这是我未来的努力方向。”刘宁表示。



张颐武

## 张颐武:多措并举 助力新大众文艺出海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陈麟

“新大众文艺”一词自2024年出现后,即在文化界引起广泛关注热议。“新大众文艺”是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由普通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文艺现象。

近年来,以互联网及各种新科技为基础、以文化产业为依托的“新大众文艺”迅猛发展,在国内有广泛的影响,受到了社会的欢迎,同时也在海外引起了关注,“走出去”已经有不少成效。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当下如微短剧、短视频等新的视听文化类型,网络文学等在国内发展很好的文学形态,游戏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业态,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以及一些和文化创意相关的平台等,都在海外受到欢迎。最

近,这方面的亮点频出,如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成功,以及具有中国的文化基因并由中国相关公司制作的微短剧,在全球不少地方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受到广泛欢迎。今年年初电影《哪吒2》的火爆,表明中国“新大众文艺”已经有了强大吸引力,对国际受众已经形成相当影响。这些“新大众文艺”的文化障碍较少,对全球公众特别是年轻人产生积极影响。其传播效果实在,传播作用明显。这些新大众文艺的“出海”,对于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张颐武表示,当下在这些“新大众文艺”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首先**,适宜更广泛传播、能够受到欢迎的优质作品可以形成巨大的传播效应,但目前优秀的作品不足,不少作品较为粗放,还难以被更多的海外受众接受。**其次**,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平台是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多样的传播路径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在海外能够发展得较为成功、能够带动文化传播并具有自主性的平台还严重不足,“走出去”的传播渠道和路径还不够丰富。**再次**,对于优秀作品和具有影响力的平台等的推介推广机制还有待强化。**最后**,对于能够创作优秀作品或能够开拓渠道、建构平台的优质企业和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也有待建立。

因此,张颐武建议:第一,对于优秀作品创作给予更多激励,建立有效机制扶持“走出去”,加大对优秀创作的奖励等。第二,对于在海外发展的互联网平台建设等予以高度关注,对于相关企业给予更多政策激励和“出海”便利。第三,建立针对优秀作品、优质平台的更多推广机制,让这些作品和平台通过更多路径“走出去”。这需要有更多海外推广的有效方式。第四,对于能够在文化“走出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企业和平台,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在政策、税收和进出口便利化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

(上接第1版)

**记者:**图书价格乱象使市场参与各方陷入“多输局面”,出版社、渠道和读者分别受到哪些不利影响?

**赵剑英:**当下,市场参与各方“多输局面”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下去没有赢家。对于出版社来说,提高定价往往失去一部分传统的市场机会和读者,而为追求薄利多销,盲目铺货备货,又会增加库存压力,进一步削弱利润空间。

对于渠道来说,市场整体折扣越来越低,他们的利润空间也一定越来越低,虽然在某本书上或某个时间点可能会收获可观的利润,但在折扣持续下行的态势下,任何利润机会都无法长久也不可能复制。即便是看起来风光无限的直播电商,只要稍微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所以,低价行为一定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读者来说,买低价书表面上的确是花更少的钱买到了心仪的书,但市场长期追逐低折扣低价,必然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图书质量下降会让读者难以买到真正优质的书。如今,一些平台已经出现不少粗制滥造的公版书、跟风书、伪书甚至盗版书,我听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抱怨“见不到好作品”,也开始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失序的市场没有赢家,并呼吁要规范图书电商销售。这是一个好苗头。

**记者:**您认为,若要使书业渠道乱象得到真正改善,应以政府政策为主导,通过行政力量来规范市场秩序,还是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

**赵剑英:**首先政府有与市场调节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要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面对市场失灵、竞争失序,政府必须予以纠正和规范。

现在包括出版社在内的各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期待良好的市场环境,出台规范图书线上销售渠道市场秩序的政策措施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我认为,真正改善书业渠道乱象必须以政府政策为主导。图书是具有文化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商品,“白菜价”“论斤斤”甚至“0.01元每本”,往浅了讲,是市场中的乱价行为,往深了讲,则是对文化的不尊重,是对知识生产、创新及其主体的不尊重,与我们国家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皆是背道而驰的。

在不少发达国家,图书都是被作为特殊商品予以对待,执行固定价格销售制度,相比一般商品,政府会对图书市场给予更多的干预和保护。我们国家更应该重视“政府之手”。立足图书文化属性,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虽然市场的力量不可忽视,且市场参与各方对价格乱象的危害已达

成共识,但我并不看好这只“无形之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的作用没让人看到,将来即便有这一天,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会是相当巨大的。

**记者:**对于加强图书线上渠道市场秩序管理,您有何建议?

**赵剑英:**一是加快推动图书价格立法。图书价格立法在当代,功在千秋,是造福万千读书人之事,是国家文化兴盛的保障,也是解决当前图书市场价格乱象的根本举措。但如今图书价格立法面临着较大困难,之前也有政协委员提过相关提案,但图书价格立法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少人对图书价格立法、限制折扣不理解,因此出现不少反对相关提案的声音。我想,既然我们要推动图书价格立法,就要研究与之相关的整个法律体系。

比如我们首先应动议把“图书”作为特殊商品排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垄断禁止”的商品范围之外。《反垄断法》第八章规定了“知识产权使用”和“农产品”两种不适合该法的情形,可以建议增加一条将图书、期刊也排除在其管辖范围外,这样才能从法理上推动图书价格的立法工作,否则图书限折就与《反垄断法》有冲突。图书价格立法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大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努力和争取,当然,图书价格立法也离不开行业主管部门的支持。

**二是调整定价政策,引导图书回归知识产品的本质。**合理的定价可以化解当前的市场矛盾,推动优秀作品的出版,加强图书的传播媒介作用,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水平。现行图书市场存在的一个显著矛盾是,出版社普遍在喊“打折太狠”,而读者则在喊“定价太高”。这实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层面是定价虚高的问题。经过多年“价格战”,出版社都有意无意地提高定价以应对低折扣,这个问题现在比较突出,但并不难解决,相信随着图书市场价格管理的持续加强,定价虚高的问题会得到改善。

另一层面是结构性问题。对图书价值的认知误差、不能体现图书真实价值的价格体系,是当前价格乱象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个问题比较隐蔽,但对知识生产和文化创新危害极大。现在出版单位都是根据纸张成本、印刷工价和发行册数制定定价标准,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导致出版社在给图书定价时主要依据成本因素或利润因素,较少去考虑图书内容的差异,进而导致图书价格结构中,知识价值长期得不到体现,这一现象不利于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也不利于图书市场的有序发展。

从长远计,我建议加强网上图书市场管理的同时,要调整“一刀切”的定价指导原则,引导出版者对不同的类别图书采取不同的定价政策,让图书价格回归各自应有的价值。比如,教育类图书包括课本、学生用书和大中专教材等,有明确的公共产品属性,应该由政府指导定价。大众出版领域是有竞争性的市场,读者面对的是海量的选择,价格仍应由市场来调节,价格管理主要是要防止市场失灵。而在专业出版领域,科技图书、学术图书的定价一方面要考虑知识普及,另一方面要强调知识价值的体现,适当高定价,做好书,做知识产品。

对原创类新书,比如文艺创作、专业学术图书设定图书最低销售折扣率,同时明确新书打折时间和保护期。此外,要积极推进实现图书线上销售与实体书店销售价格的一致性。要扶植保护实体书店,防止电商平台实际成为书业销售垄断企业。这一过程中,要持续严厉打击盗版、劣质图书、伪书的出版销售。

**三是出版机构应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履行社会责任,面对不合理的市场秩序,要保持战略定力。**出版机构面对当前图书价格乱象,虽有被动无奈的成分,但一些出版社也难辞其咎。为了缓解平台带来的低价压力,一些出版机构放任图书重印再版降低生产标准,甚至有些出版机构为弥补损失,大量推出质量低劣的公版书。这种短视行为严重损害行业生态。出版机构应加强自律,出版人更要坚决抵制这类现象,共同发力,维护健康的出版环境。

**四是重视出版研究和舆论宣传。**舆论先行,首先要阐明目前价格乱战的危害。读者能直接感受低价促销行为带来的好处,但无法直接感知到这些行为对文化生产、知识创新的破坏性,也无法直接感知到这些行为从长远看会造成图书市场的混乱,使自己成为最终的受害者。这就需要我们出版从业人员、有识之士要重视出版研究和舆论宣传,对平台从业者和读者予以正确的引导。

无论是现在亟须推进的图书线上销售渠道市场管理措施,还是根本性的图书价格立法,抑或定价政策调整,都要做好读者的思想工作和解释工作,要讲清楚价格乱象的危害性,进行充分的舆论动员。要传播相关理念,让读者明白对图书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重大意义、背后的长远考量及其给读者带来的益处。其二,要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核心是要科学认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出版在文化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这也是出版业和其他文化产业在各环节真正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必然要求。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聂慧超

**刘宁:学术专著遇冷亟须破局「论文至上」功利导向**